

习近平经济思想标识性概念研究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张俊伟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和供求关系变化，创造性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标识性概念，并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近年来，我国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要义、找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对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灵活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度面临诸多挑战，出现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经济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导致需求大量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却大量依赖进口；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需求旺盛，但国内高端产品生产能力不足，消费者热衷出境购物、“海淘”购物，甚至出国抢购保温杯、电饭煲、马桶盖等普通日用品。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西方供给学派，兴起于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失灵之际，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主张通过减税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从而增加生产和供给。供给学派只强调供给而忽视需求，主张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干预。与之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则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

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科学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两者既相互依存、又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反过来，没有供给，需求则无法满足，新的供给也可以创造出新的需求。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从需求侧来看，主要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手段来调整；从供给侧来看，则注重解决结构性问题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宏观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内外环境与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面对“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201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出治本良药。通过大力推动“破、立、降”，供需结构失衡得到矫正，有力保障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8年，党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要求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上下功夫。通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有效改善。2020年以来，受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影响，总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

近年来，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突出特点。党中央科学统筹总供给

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2月11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和总需求的关系，深刻把握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规律，推动我国经济在向新向优发展中夯实底座、赢得主动。2012年至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40万亿元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聚能成势，正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聚焦重点领域靶向发力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中各种老问题、新挑战，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直面供需矛盾，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促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努力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之优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感愿消费。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进一步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用好用足超长期特别国债。把促进经济稳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持续优化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

机构加力支持重点领域，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直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企业开展绿色设计和生产。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功能布局。坚守安全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统筹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深化要素和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通过综合施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适应需求侧的变化特征、需求侧管理更好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节奏和方式，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把握新机遇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郭冠勇

数字中国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提升数智化水平”，为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数字中国指明了方向。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深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我们要顺应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和科技创新趋势，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步伐，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数字技术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显著特征，是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关系再造、经济结构重塑、生活方式巨变的先导力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加速突破，与其他技术交叉融合，形成新的组合式技术族群，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重大跃升。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能够提高生产要素的匹配效率，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中国建设通过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刻改变产业形态和生产组织方式，显著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同时，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们分析复杂问题、预判潜在风险、实现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工具。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当前，世界各国围绕数据资源和数智技术的竞争日益激烈。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深化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有助于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提升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依托“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加强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分享数字技术发展机遇，有助于缩小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共同

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49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10.5%以上。5G基站数达483.8万个，算力总规模居全球第二，人工智能专利数约占全球总量的60%。“人工智能+”行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覆盖城乡。数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与多个国家签署数字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带动数字贸易增长，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热潮涌动。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依然面临不少挑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数据制度体系还存在短板，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网络安全风险等问题值得关注。

例如，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全球领先，但数字产业总体上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领域创新更多集中在应用层面，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不足，“缺芯少魂”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集成电路、工业软件、基础原材料等领域对外依存度较高。2025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约为3.04万亿元，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国产化率偏低。数字企业全球竞争力仍与国外领先企业存在差距，我国头部互联网科技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普遍较低，全球化布局与技术输出能力偏弱。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与深度均有待提升。

又如，制度供给有待强化，要素活力仍需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流通交易规则标准和定价机制不够健全，数据资源持有、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在实践中面临不少难点，地方保护、行业壁垒

制约数据自由流通。数字经济统计口径未完全与国际接轨，影响数据的国际可比性。高端数字技术人才、复合型管理人才供给不足，全民数字素养有待提升。

再如，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够均衡，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数字基础设施存在较大差距，中西部算力枢纽利用率不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仍明显低于城市。“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和安全保护的平衡难度较大，数据泄露、数据滥用等问题时有发生；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体系尚不完善，难以满足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新形势需要；适应数智技术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治理体系亟待完善，算法歧视等问题日益凸显，影响数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数字中国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要牢牢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聚焦突出问题，明确发力方向，推动数字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第一，强化技术攻坚，加快数智技术创新。紧盯集成电路、高端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强化技术攻关，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加快推动“卡脖子”领域相关产品国产化替代。持续加大数字技术基础研究投入，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场景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

第二，瞄准数据蓝海，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行业壁垒，加快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制定公共数据开放目录，完善数据交易制度，加快推进数据资产入表，探索数据资产定价模型。强化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支撑，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创新应用场景，聚焦金融、医疗、交通等领域培育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提升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水准。

第三，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坚持算力、算法、数据协同发力，优化全国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布局，推进算力资源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普惠化发展。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提升调度效能与利用效率，推动西部重点承接非实时算力需求、东部积极布局边缘计算节点，优化算力资源配置。

第四，完善数字治理体系，保障产业健康发展。建立数据安全分级防护机制，构建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体系，提升数据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拓展数智领域国际合作，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扩大“丝路电商”朋友圈。

第五，加快推进数字社会建设，创造美好数字生活。深入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将数字技能培训纳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深化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建设，扩大远程医疗覆盖范围，升级智慧教育平台。大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支持智慧农业发展，让数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算法与算力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函数。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创新迭代，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制造”，对于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在传统制造模式中，研发、生产、运维等环节存在数据割裂等问题，容易导致资源错配与决策迟滞。工业大模型的出现，打破了跨部门、跨系统、跨阶段的数据壁垒，实现了信息高效流转。例如，在研发设计阶段，人工智能可基于历史产品库和用户反馈自动生成多套设计方案并进行性能仿真；进入量产阶段，能够动态调度设备、材料、人力等，实现智能排产与能耗优化；在售后服务端，则可通过分析设备运行数据提前预警故障，实现预测性维护。这种全流程嵌入式的智能协同，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降低了试错成本，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研发能力。

人工智能赋予生产系统自主感知、判断与优化的能力，推动制造体系向复杂自适应系统演进。通过部署工业传感器、机器视觉和边缘计算设备，生产线可实时采集设备状态、工艺参数与环境变量等；依托深度学习与强化学习，系统能自动识别异常、预测趋势并动态调整运行策略，实现边运行、边学习、边优化。这种智能化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良品率与资源利用率，更深刻重塑了制造范式。例如，在研发端，催生了平台化设计，支持跨地域协同与方案快速迭代；在制造端，实现了柔性化生产，一条产线即可快速响应多品种、小批量订单需求；在价值链后端，推动服务化延伸，促进企业从单纯卖产品转向提供“产品+数据+服务”的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有助于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智能制造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生产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显著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催生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也要看到，当前“人工智能+制造”融合发展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制约其向全链条、全要素、全场景纵深推进。工业大模型、AI芯片、工业操作系统等软硬件关键技术仍需集中攻关，通用大模型难以适配制造场景对高可靠性、低延迟的要求，加之算力资源分布不均，中小企业面临部署成本高、技术门槛高等问题。装备、原材料、消费品等不同行业的智能化需求差异大，尚缺乏可复制推广的应用范式，同时，设计、生产、运维等环节数据壁垒问题突出，高质量工业语料库不足，容易造成模型训练精度不够、应用效果打折。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未充分发挥，专精特新企业缺乏适配产业场景的轻量化智能工具，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普遍存在“不敢转、不会转”等问题。制造领域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尚不健全，针对AI幻觉、供应链安全等风险，尚未构建起成熟有效的治理机制。更关键的是，既懂工艺又懂AI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协同不够，制约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精准发力，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制造”。

夯实技术底座。可考虑聚焦工业大模型、AI芯片、工业操作系统等核心软硬件，设立重大专项，支持开源框架与行业模型协同开发。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向制造集聚区下沉，推广大模型一体机和边缘计算服务器，降低企业应用门槛。鼓励高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组建人工智能创新联合体，聚焦人工智能架构、通用算法、小模型与多模态融合等重点，形成从基础研究、原型验证到场景应用的协同攻关体系。

注重场景牵引。针对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等不同领域，梳理高价值应用清单。深入推进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加快大模型技术在生产制造核心环节的深度应用，全面赋能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各流程，显著增强智能辅助设计、仿真建模、智能排产调度、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关键能力。同步建设多个高质量工业数据集，打破数据孤岛，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加强主体培育。对中小企业推行“算力券”“模型券”等普惠性支持政策，依托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提供低成本、模块化的AI工具包。支持建设工业智能体软件商店，促进工业APP规模化商用。大力支持创新创业企业发展，设立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投向产业链关键核心领域，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强化制度保障。加快制定制造领域人工智能标准体系，涵盖数据接口、模型评估、安全认证等内容。建立工业AI安全治理机制，重点防范AI幻觉、算法偏见、供应链断链风险。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推动高校、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将提升AI素养等融入工程师继续教育培养方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